

罗正钧 著

左宗棠年谱

岳麓书社

K822/135

左宗棠年谱

罗正钧著 朱悦 朱子南校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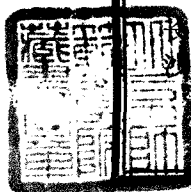
岳麓书社

一九八二年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37308



左宗棠年谱

罗正钧 著

责任编辑：边仲仁

岳麓书社出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3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90,000 印张：13 印数：1——6,500

统一书号：11285·18 定价：2.50元

序

蔡尚思

凡是学过一点中国近代史的人，对于左宗棠的名字都不会感到陌生。

这个人，从在湖南湘阴老家做塾师起步，直到成为晚清赫赫有名的封疆大吏，曾经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无论军事、内政、外交或经济领域，都留下过脚印。尽管那些脚印深浅不等，但只要研究那三十年的中国历史，则不管对他喜欢不喜欢，都不得不时常同涉及他的事件打交道。

因此，系统地了解左宗棠的生平，了解他对有关的中国问题或国际问题的认识过程，了解他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面前的实际表现，就对我们不但有益，更有必要。

为什么说是必要的呢？因为左宗棠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清朝晚期的一名封建统治阶级的重要成员，一股封建地方势力的头面人物，一个所谓洋务集团的主要首脑。他的思想信仰，他的政治主张，乃至他的性格和作风，都不可避免地要给有关历史事变的进程，或多或少带来影响。

就是说，这个人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统治阶级在一个历史阶段的缩影，至少是一个侧面的缩影。难道我们不该花点力气去了解他的个人历史吗？

多年来，我在研究近代思想史的过程中，就常想找一部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南而编撰的左宗棠传记，可惜尚未如愿以偿。不得已只好看看面前这部清末罗正钧所纂《左文襄公年谱》。

但就是这部十卷本年谱，有时也索阅为难。因为它原是《左文襄公全集》的附录。《全集》虽非孤本秘籍，却只有一八九七年湘阴左氏家刻本传世，数量既少，卷帙又繁。倘想随时检索其中的年谱，真是麻烦得很。

正因如此，湖南岳麓书社决定把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予以校点，单行出版，就使我很赞成。我认为，这将给读者带来很大方便，无疑是做了一件好事。

当然，我表示赞成，还因为这部年谱具有出版价值。

我们学术界向来重视利用各种年谱，那是有道理的。年谱属于历史人物的个人编年史。它与一般编年史相同之处，在于都按照年、时、月、日的时间序列编排史事。但它的背景不及一般编年史广阔，而反映历史进程的精细程度，却超过一般编年史。

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一部好的年谱，就象透过显微镜观察江河里的一滴水，由它的成份可了解江河的水质，而透过个人一生的变化过程。也有助于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全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知人论世。

自从年谱作为一种历史编纂形式出现以来，大概已有一千年。它总共刊行过多少？现存还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就编纂目的来看，现存的年谱约略可分数种：研究型的，编者多为后世专家；卫道型的，编者不外是自命为古圣先贤正宗嫡传的人物；回忆型的，即由谱主本人生前所作的自订年谱；扬名型的，多为谱主的子孙门人所编，也有为了攀附名人以扬己之名的不学无术之徒所编。

旧时代的年谱，以后三种类型居多，因而除了少数学者的作品而外，本身都称不上什么学术著作，而且有大量的粗制滥造货色。因而，我们如今鉴定它们的好坏，仅能依据它们的史料价值，主要是看它们各自保存的史料的原始性、丰富性、可靠性和全面性。

对旧时代的年谱作者，很难提出反映全面的要求。因为他们不仅受到眼界的限制，更其受到主观意向的限制，例如“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之类陈腐观念，以及宗派门户偏见等等，都使他们不能直书足以暴露谱主不可告人秘密的事实，即使对人所共知的谱主的罪行丑闻，也必然要为之曲笔讳饰。所以，只要编者少存心溢美，不故意造假，搜录详尽，言有佐证，事经考订，这样的年谱便可算较好的一种。否则就只好归入下乘乃至劣制，尽管其中也许不乏有用的材料。

罗正钧编的这部左宗棠年谱，属于哪一种类型呢？

显然，他的目的在于表彰谱主的功业，他的编撰也在谱主的亲族密切注视下进行。他甚至没有按照惯例写篇序言，说一说发凡起例到杀青付梓的过程。可以想见，他的忌讳不少，或者掣肘者更多。因而，我们当然不能指望从中发现编者秉笔态度的客观与公正。

但编者的有利条件也是存在的。他得到左宗棠亲属的支持，编成的时间上距左宗棠去世的一八八五年，不过十二年。这样，他不但可以充分利用左氏家藏的谱主本人留下的全部材料，包括奏议、文稿、书信、诗钞、论著，以及官私文书、家谱行状等等，而且可以设法得到谱主的亲戚朋僚、门生故吏的帮助，了解其它有关的文字或口头的材料，这在年谱中都有反映。同时，对于载入年谱的各种事情，编者也明显地用过一番考订功夫，证成一说

常列举两种或两种以上材料，有时还表示存疑。

因此，就史料价值来说，这部年谱至少有几点可以肯定：第一，保存材料较多，基本上都是第一手的，传闻成份较少，而且有若干材料不见于其它文献；第二，采择方面较广，大凡左宗棠的生平经历和主要事业，政治态度和思想抱负，以及为人处世等等，都有反映；第三，叙述事实大致确切，因为材料经过筛选和考订，尤其在判断材料的时间性上花过力气，所以前后颠倒、自相矛盾的毛病犯得较少，从而提高了记录的可靠性。

我想，这部年谱虽然有隐讳，有粉饰，字里行间时时流露理学之徒的迂腐气息，但它问世以来，受到学者重视，至今还不失为近代史研究的一种有用史料，理由也在于此。

不过我赞成校点重印这部年谱，还因为我觉得左宗棠这个人值得研究。除了开头所说的理由以外，他在阶级斗争和民族危机中间的矛盾表现，也十分引人注目。

谁都知道，左宗棠是靠着镇压农民革命起家的。这个二十一岁中举后便屡试不第的封建知识分子，虽然才干早受陶澍、林则徐等赏识，但如果不是太平天国英雄们打得清朝统治阶级阵脚大乱，那末他也决不可能成为地主阶级的“英雄”。就在曾国藩组建湘军之后，他也有好几年只是充当湖南巡抚的幕僚，限于出谋画策，因为清朝皇帝不理睬曾国藩、胡林翼等的多次保荐，拒绝授予他统带地主武装的资格，直到一八六〇年才勉强同意他随同曾国藩帮办军务。那时左宗棠已四十九岁，急忙纠结五千人，自树一帜，号称楚军。如所周知，这时太平天国已在走下坡路。但在力量已由内讧而削弱的农民武装面前，楚军也连吃败仗，最后不得不仰仗法国流氓武装的洋枪保护。

可见，当左宗棠站在地主阶级反革命立场，与起义的农民为

敌，不管他个人如何能干，也是不行的。罗正钧在年谱中竭力描绘左宗棠没有得到指挥权前两湖局势如何危急，而楚军组成后局势如何大变，本意是在制造“此人不出，奈苍生何”的印象，效果却适得其反，刚好证明左宗棠运筹帷幄之中也好，亲临战阵指挥也好，都不是什么手握扭转乾坤之力的“英雄”。对于年谱这段记载，我们也只能看作是颠倒历史。

左宗棠接着镇压捻军起义的历史同样表明，使他取得“功臣”称号的主要因素，也在于捻军比后期太平军更涣散，更具有旧式农民战争的一切弱点。拿着外国侵略者送来的新式杀人武器来屠戮仅有原始刀矛的革命农民，还竭尽力气才勉强取胜。在这一点上，左宗棠比他的年谱编者略有自知之明，因为他曾向皇帝承认，那些“平发捻”的善战将领的秘密，就在都喜欢使用洋枪洋炮。

然而左宗棠最终仍然得到历史的纪念。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他早年反对英国侵略的慷慨议论，曾使因领导反侵略战争而遭投降派打击的林则徐为之倾倒。他晚年主持反对沙俄、英国侵略新疆阴谋的战争，证明他在民族危机的严重考验面前，保持了作为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气节。尽管与也曾镇压人民起义的林则徐相比，他对人民犯下的历史罪过要大得多，可是他把西方列强供应的新式枪炮掉转来指向外国侵略者和民族叛徒，有效地挫败了沙俄和英国攫夺我国大片领土的狂妄计划，在客观效果上也比林则徐主持的反侵略事业更有成就。这就使中国人民虽然谴责他反对革命的罪行，却始终将他同曾国藩、李鸿章相区别，不仅承认他晚年率军收复和保卫新疆领土的历史功劳，而且认为他是历史上值得尊重的一位爱国主义者。

中国人民是重视民族大义的。近代中国曾经受过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如此严重的欺侮，使我们的民族遭到那样大的不幸，使

我们的人民遭到那样重的灾难，更加深了中国人必须团结御侮的共同认识。任何中国人，即使象康熙那样的专制皇帝，即使象左宗棠这样双手沾染过人民鲜血的封建官员，只要他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生存做过一点好事，都会令人民感动和纪念。

正是在保存左宗棠晚年为保卫国家领土而努力的有关史料方面，使罗正钧编纂的这部年谱具有特殊价值。编者搜录相当详备，叙述也很清楚。左宗棠以古稀之年出任陕甘总督，面对英俄侵略者支持民族叛徒在新疆建立傀儡汗国的严重挑衅，背受李鸿章为首的清朝对外妥协势力反对收复新疆的沉重压力，而坚决主张用兵，并亲自部署和指挥战争全局；同时，在消灭傀儡政权的战争过程中，又拒绝英国侵略者的外交讹诈，准备同拒不归还中国领土的沙俄侵略者决战；而在战争胜利后，又为稳定新疆的安全作了许多努力。如此等等，在年谱里都有较系统的记载，而且反映的内容均属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溢美不实之词就少得多。应该说，关于左宗棠晚年的历史，是这部年谱编写得比较成功的部分。

承湖南岳麓书社同志的好意，要我给这部即将重印出版的《左文襄公年谱》写篇序言。我对左宗棠的生平没有作过专门研究。而出版社同志将校点过的年谱复印稿寄来的时候，我适因腿伤住院数月，至今仍然行动艰难，坐困斗室，无法研究有关材料，也没有力气细细阅读校点稿，结果迟疑不克动笔。现在，既经出版社同志屡加督促，只得勉为其难，写下一点想法，为总想替繁荣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做好事的湖南岳麓书社同志助助兴，并就正于方家。

一九八二年八月蔡尚思序于
上海复旦大学

出版说明

本书原名《左文襄公年谱》，清末湘潭罗正钧编纂。现改今名，校点重印出版。

这次重印，以“湘省学院街萃文堂刻刷局缮刊”本为底本。在校点过程中，参阅《左宗棠全集》、《左宗棠在西北》等书，补正了少数明显的脱漏和错字，此外未作任何删削改动。

目 次

序.....	蔡尚思 (1—6)
卷一(一岁至四十二岁).....	(1)
卷二(四十三岁至五十岁).....	(37)
卷三(五十一岁至五十四岁).....	(84)
卷四(五十五岁至五十七岁).....	(123)
卷五(五十八岁至五十九岁).....	(173)
卷六(六十岁至六十二岁).....	(214)
卷七(六十三岁至六十四岁).....	(266)
卷八(六十五岁至六十六岁).....	(308)
卷九(六十七岁至六十八岁).....	(341)
卷十(六十九岁至七十四岁).....	(373)

卷 一

(一岁至四十二岁)

公姓左氏，讳宗棠，字季高，一字朴存，早岁自号“湘上农人”。公子孝同《先考事略》云：“府君自移家柳庄，日日巡行陇亩，自号‘湘上农人’。”按：公《家书》甲子以前纸尾往往自署“湘上农人”。

先世自南宋时已为湘阴人，世居县东乡左家墩，代有闻人。景乔先生《慎盦文钞·族谱序》云：“吾族自汤盘公登宋嘉定进士，历官两浙路采访使，浙民爱之，为立去思碑。明，心南公，万历间官行唐县知县，知深州事，旋擢辽东监军道，参经略熊廷弼军事，廷弼甚倚重焉。公从祖弟任庵公，值张贼犯长沙，逼以伪官，抗节不屈遇害，忠孝照耀湖湘间。国家承平二百年，吾族支派繁衍，其间忠孝节义，散见于郡邑之志载及家乘之所传闻，乡人士类能言之。”按：《湘阴县图志·氏族表》：“汤盘公，讳大铭；心南公，讳天眷。”据表：心南公为公九世祖。

曾祖讳逢圣，字孔时，一字仁乡，县学生员，以孝义著闻。妣蒋氏。《湘阴县图志》本传云：“左逢圣，字孔时，邑庠生，性恭慤。大父染疾数年，虽异居，与其父庠生定师朝夕侍奉；尝亲持秽服，临江浣濯，涕泗交流，见者叹其诚孝。居贫好施，尝于高华岭设茶数年，以济行人。乾隆十七年，岁歉，典衣服，与富人之乐善者，施粥于袁家铺。生平举止端严，所读经史皆手录。著有《存塾文稿》数卷。”

祖讳人锦，字斐中，一字松野，国子监生；为族仓备

荒，岁歉，一族无饥人。妣杨氏。《湘阴县图志》本传云：“左人锦，字斐中，一字松野。父逢圣，诸生，以孝义闻。人锦承家教，多所修建，尝仿社仓法，倡捐谷，为族仓以备凶荒。岁歉而左氏无饥人。著有《族仓条约》。”善化贺氏熙龄《寒香馆文钞·左斐中像赞》云：“季高述其尊祖斐中先生律躬之严，闲家之肃，敦睦家族推济邻里之义，余于是而又知其世德相济，积累深厚。”

父讳观澜，字晏臣，一字春航，县学廪生，贫居教授二十余年，妣余氏。《文集》卷一，《钱南园先生文存序》云：“先世耕读为业，以弟子员附郡县学籍者凡七辈。”《家书·壬戌与孝威书》云：“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尔母归我时，我已举于乡。境遇较前稍异。然吾与尔母言及先世艰窘之状，未尝不泣下沾襟也。吾二十九初度时，在小淹馆中曾作诗八首，中一首述及吾父母贫苦之状，有四句云：‘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餐。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至今每一讽咏及之，犹悲怆不能自己。”按：《诗集》“研田”句自注云：“父授徒长沙，先后廿余年，非修脯无从得食。”“糠屑”句自注云：“嘉庆十二年吾乡大旱，母屑糠为饼，食之仅乃得活。后长姊为余言也。伤哉。”

三代皆以公贵，累赠光禄大夫，二等恪靖侯。妣皆累赠一品侯夫人。公兄弟三人，长兄宗棫，字伯敏，一字瑟卿，县学廪生，早卒。仲兄宗植，字仲基，一字景乔，道光乙酉拔贡生，壬辰本省乡试第一名举人，官桂东教谕，改内阁中书。为诗古文有盛名，尤精于天文，著有《慎齋诗文钞》四卷。《湘阴县图志》本传云：“左宗植，字仲基，一字景乔，父观澜，以善书名。宗植，道光五年拔贡，十二年解元，选授桂东教谕，改内阁中书。宗植幼时与兄宗棫、弟宗棠，并有时名。宗棫，廪生，早卒。而宗植、宗棠名益显。宗植以诗古文自豪，有湖南四杰之称，谓邵阳魏源、郴州陈起诗、益阳汤鹏，并宗植也。尤精于天文，考订《开元古经》行世。宗植任内阁中书，祁文端公隸藻掌军机，深信其言。大学士赛尚阿视师广西，宗植独以为非宜，而言曾国藩足当大任。江忠源朴干任军旅，其后皆以功名显，由宗植发其端也。所著《朴学斋存稿》，宗棠为分刻之，曰《慎齋文钞》二卷、

《慎齋詩鈔》二卷”。《文集》卷一《慎齋詩文鈔序》云：“兄詩，尚朴忌巧，務苦吟，為古文辭，先根底，後枝葉，漸進於作述之林，視時流少當意者。晚研天文家言，于中西法各有所取。其推步占驗，有應有不應，兄不輕為人言；或有言，余亦未能遽省也。”公其季也。

嘉慶十七年壬申，公一岁。

十月初七日寅時，公生于湘陰東鄉左家墩。公子孝同《先考事略》云：“時曾祖考松野公、妣楊太夫人年近八旬，均健在。世父瑟卿公，年十三歲。仲父景喬公，年九歲。姑母三人，長年十六歲，餘均數歲。先祖年三十五，祖妣年三十八，始生府君。將生之夕，祖妣夢有神人自空中止于庭，謂‘牽牛星下降’。驚寤而府君生。室中忽有光如白晝，燈燭皆掩，移時天始曙。”按：《家書·甲子與孝威書》云：“吾家本寒素，爾父生而吮米汁，日夜號聲不絕，臍為突出，至今腹大而臍不深。吾母嘗言育我之艱，嚼米為汁之苦，至今每一念及，猶如聞其聲也。”

是年，春航先生讀書岳麓書院。《文集》卷五，《祭胡文忠公文》云：“我生于湘，公产于資。歲在壬申，夏日冬時。詹事文學，讀書麓山。兩家生子，舉酒相歡。”按《胡文忠公年譜》，生于是年六月，公生以十月，故云夏日冬時。又考公《書牋》卷十五《與江小岷都尉書》云：“尊翁與吾同月生，吾遲四月，蓋新寧江忠烈公亦以是年生也。”

嘉慶十八年癸酉，公二岁。

嘉慶十九年甲戌，公三岁。

是年五月二十四日，楊太夫人卒，壽八十歲。

嘉慶二十年乙亥，公四岁。

公幼有異表。景喬先生《慎齋詩鈔·癸亥大寒日余東安表弟訪予高坡感旧書懷長歌奉贈兼寄舍弟季高詩》有云：“青毡長物付诸兒，燕領封侯望予季。”自注：“先太夫人語意也。”松野先生携之讀書梧塘。《詩集·題羅叔如讀書秋樹根圖》詩云：“夢到梧塘屋兩間。”自注：“梧塘，為先祖課諸孫處。”按：明年移家會城。據詩所云，則梧塘課讀必是年事也。特愛異之，常曰：“是子足昌吾門。”公子孝同《先考事略》云：“松野公嘗携

公步上宅后山掇小栗，盈掬，命归貽兄姊。公持归均给，不自取食。松野公喜曰：‘此子幼时分物能均，又知让而忘其私，异日必能昌大吾门。’”

嘉庆二十一年丙子，公五岁。

春航先生是岁挈家迁居会城贡院东左氏祠，开馆授徒。公从二兄入学。《慎龠文钞·湘阴左氏试馆记》云：“先是左氏宗祠在长沙府城贡院之东街，嘉庆间，大父松野公逮先府君实创建焉，府君旋僦居之，余兄弟读书其中。”《文集》卷一《慎龠诗文钞序》云：“余兄弟三人，侍先公读书，比长，不名他师。”又《文集》卷三《候选训道左君墓志铭》云：“君与余同岁生，少受业于先公之门，与余同研席。余以先公幼子恃爱，日诵所授书毕，即跳踉嬉戏，君则端坐默识，目不左右顾。”颖悟过人。公子孝同《先考事略》云：“府君始受学，每听先祖讲授生徒及世父、仲父诵读之书，辄默识不忘，偶属对，颖悟异人。一日，先祖课世父、仲父读《井上有李》文，至‘昔之勇士亡于二桃，今之廉士生于二李’句，因问‘二桃’典何所出，府君在侧应声曰：‘古诗《梁父吟》有之。’亦平日所闻于二兄诵读者也。”

是岁，仲兄景乔先生入县学，年十三岁。长姊寿清，适同郡朱氏。《慎龠文钞·朱氏先姊墓志铭》云：“显考春航府君女子子三人，其一名寿清，宗植姊也，年二十，归同郡朱君震扬。”

嘉庆二十二年丁丑，公六岁。

是年，读《论语》、《孟子》。按：《正谊堂全书》卷首公与杨雪沧书云：“紫阳学统，弟何能窥其百一，然自六岁读《论》、《孟》时，即兼读《大注》。”

九月二十六日，松野先生卒，寿八十岁。

嘉庆二十三年戊寅，公七岁。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公八岁。

是年，伯兄伯敏先生入县学，景乔先生科试高等，补廪膳生。

春航先生教子严，为文必依传注论经旨。数年之间，从

游者日众。善化贺氏熙龄《寒香馆文钞·左斐中像赞》云：“左子季高从余游，询其学之所自，则一稟于尊甫先生之教。其教于家者，必本于身，肃然翼然，尊卑上下，罔敢稍越。余于是而知季高学业之成就，其父教然也。”《文集》卷三，《长沙徐君墓表》云：“先文学教人为文，必依传注经旨，不尚藻绘。”公子孝同《先考事略》云：“先祖教人循循善诱，于课子尤严，数年之间入学食饬，一时从游者甚众。”

嘉庆二十五年庚辰，公九岁。

初学为制艺。《正谊堂全书》卷首，公与杨雪沧书云：“九岁学作制艺，先子每命题，必令先体会《大注》，一字不许放过。”间读史，辄慕古人大节。《书牋》卷八，乙丑《答吴桐云书》云：“仆自童儿时，即知慕古人大节。稍长，工为壮语，视天下事若无不可为。”

道光元年辛巳，公十岁。

是年，城中讹言纸人剪辫发，经旬月乃定。《书牋》卷十七，丙子《答杨石泉中丞书》云：“浙中纸人剪辫之说，来自吴中。道光初元，长沙城中亦有此谣，并有鸡生四翼五爪之说。第时甫十龄，每闻人语藉藉，心辄疑之，睡醒辄摩其顶，知吾发无恙，乃复安眠。晓行市廛，见家鸡狼藉殆遍，行人相戒勿近，询知鸡啄人即毙也。扰攘旬月，始获安息。”

道光二年壬午，公十一岁。

是年，族人议迁祠于湘阴。《书牋》卷八，丙寅《与李仲云书》云：“贡院东街旧祠，为弟少时嬉游之所，至今犹时时入梦。”公子孝同《先考事略》云：“府君尝言儿时从先祖读书族祠，会族人有移祠入乡之议，购大木植立。木有大孔，日间课毕，戏其旁。夜梦如戏以身入孔中，则别有天地，山水清幽，深林茂树，蔚然胜境。循山而上，松竹交映，石径芊确。跻其巅，有古寺，为吕子鍊真之所。炉香燃半炬。旋取香，循旧径归，遂惊而寤。后四十余年，平定两浙。甲子重九日，为杨石泉宫保寿辰，偕游天竺灵隐，登眺间恍然如当日梦中所历。”按：《慎齋文钞·左氏试馆记》云：“府君歿，祠迁于乡，族众以其地鬻诸他氏。季高出襄戎事，念畴昔家庭夙兴夜寐，吾兄弟艰苦诵读歌哭之地，禄入渐厚，求故物鬻诸他氏者，倍称买之，为读书应试者馆焉。”据此，则祠迁于乡，在春航先生既歿以后，是岁仅购木，有迁建之议也。

道光三年癸未，公十二岁。

始留意书法。《文集》卷二，《法华寺碑跋》云：“北海法华寺碑，世称孤本。道光初，先仲兄景乔先生从劳文毅公许借得一本示余，盖贺耦耕尚书所藏者，爱玩不置。未久，劳复索还。光绪三年，余持节酒泉，督诸军平西域。王霞轩观察赠我是本，属从事李佐兴钩泐诸木，以广流传。溯自创见至今，盖五十又四年矣，头白临边，追维曩昔，仿佛长沙夜读时也。”按：光绪三年为丁丑，上溯五十四年，正道光三年癸未。又，《文集》卷一，《钱南园先生文存序》云：“余童时，见先生所书联幅，及行校官批牍与滇人仕于湘者函札，字皆平原遗法。间亦画马，风髣雾鬣，筋骨显露，笔力仿佛古篆，不敢逼视。”按：言童时，则钱通副书画，亦必此数年间之所见也。

伯敏先生岁试补廪膳生。是岁二月卒，年二十五岁。《文集》卷一《慎盒诗文钞序》云：“长伯敏早卒，先公伤之，故课仲、季书不如伯之严，诗古文令略识涂辙而已，不责其专且工也。”

道光四年甲申，公十三岁。

道光五年乙酉，公十四岁。

公属文，每一艺成，喜自负，侪辈皆已惮之。《文集》卷三，《长沙徐君墓表》云：“君道光初，偕弟蓉受书先文学之门，有所绳削，君屏息听受唯谨。余时年十四五，好弄，敢大言，每成一艺，辄先自诧，以视君，君微笑而已。”

是年，景乔先生充湘阴县拔贡生。《慎盒诗钞·题观亭从游图诗注》云：“先是寿阳公于道光乙酉督学湖南，拔取长沙诸生试《凌云阁赋》，宗植及陈君尧农、劳君辛阶诸人，同入等。”按：寿阳公，寿阳祁文端公俊藻也。试《凌云阁赋》，当是上年科试事。言乙酉者，举科分言也。

道光六年丙戌，公十五岁。

始应童试。公子孝同《先考事略》云：“年十五，应童子试。”

是年，景乔先生入都，朝考列二等，寻选新化训导。

道光七年丁亥，公十六岁。

五月，应府试。知府黄安张公锡谦奇其文。试终，已拟